

# 三国果报故事之流变

陈冰如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三国果报故事首见于《五代史平话·梁史平话》,复见于《三国志平话》以及明代《喻世明言》,由只字片言逐渐发展为完整的话本小说《三国因》,呈现出系统的嬗变轨迹。在演变过程中,最明显的特点是文人性的加强,主要表现为议论性、准确性和个性化。三国果报故事一直被因袭,由三个因素共同决定:蕴藏商业潜能的题材,符合接受群体的审美趣味,满足编创者娱乐与劝惩的创作心理。

**关键词:**话本小说;因果报应;流变;文人性

中图分类号:I24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4348(2021)02-0193-06

## Flowing deformation of the Karma 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CHEN Bingru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The karma 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was first found in *Tales from the Five Dynasties*, and again in *Popular Stories of the Three Kingdoms* and *Instruction Stories to Enlighten the World* of the Ming Dynasty. This story developed from a short line into a complete text of a story, *Origin of the Three Kingdoms*, which took on a systematic transmutation track. In the process of evolution, the most demonstrable feature is the enhancement of literati value, mainly manifested in argumentation, accuracy as well as individuation. The continual inheritance of the Karma 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was decided by three factors: it has the subject matter that contains the commercial potential, conforms to the aesthetic taste of the audience, and satisfies the creator's desire to entertain and persuade the readers.

**Keywords:** vernacular novels; Karma; flowing deformation; literati value

因果报应思想对于古代小说的渗透早已为学界所关注,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果报观对思想主题与叙事模式的影响上。而三国果报故事的价值却不只局限于其中蕴含的果报思想,而是在于这个故事本身。话本小说中三国果报故事的流变经历了由宋元至清的漫长过程,几乎与整个话本小说的发展历史同步。它的形成和发展不失为观照话本小说文本生成的好角度。

### 一、三国果报故事演变述略

三国果报故事首见于《五代史平话·梁史平话》。此书开篇呈现出中国叙事作品惯有的时间

整体观,即“首先展示一个恢弘的时空结构”<sup>[1]</sup>,以历史兴衰事为入话,自开辟鸿蒙始,遍述朝代更替直至汉代,叙刘邦屈杀功臣韩信、彭越、陈豨,天帝决冤狱,令刘邦托生为汉献帝,三人则往三国分别托生曹操、孙权、刘备,共分刘家天下以完此账,以此作为后文引子,赋予后文命运感。此即后世《三国因》最原始的版本。由于只是入话的一部分,可谓一笔带过,尚未构成情节且文笔粗陋。

三国果报故事复见于《三国志平话》,立意与《五代史平话》无异,仍被安排于入话处作为历史的起因。所涉人物由四位增至七位,其中刘邦、韩信的裁决沿袭《五代史平话·梁史平话》,彭越改

托生为刘备、易陈豨为英布托生为孙权。另增吕后、蒯通、司马仲相三人,分别为伏皇后、诸葛亮、司马懿前身。较之于《五代史平话》,《三国志平话》中三国果报故事的发展意义不仅仅在于篇幅加长。虽然三国果报故事在二书中同属入话,但是在《五代史平话》中仅为片段,而后者则对其加以发挥增益,敷衍为首尾完具的故事,不仅情节已现《三国因》雏形,主人公司马秀才的形象也首次出现。而对于三国故事系统的发展而言,《三国志平话》所增加的诸葛亮和司马懿来历也反映出民间对这两位三国人物的关注与兴趣,“标志着民间讲史对历史进行深入思考与订正”<sup>[2]</sup>。

“至明代冯梦龙,搜括宋元旧本拟《古今小说·闹阴司司马貌断狱》”<sup>[3]</sup>,宋元平话中平平无奇的三国果报故事至其笔下,整体风貌为之一变。首先,事件更为繁复。冯氏于原来的“屈杀忠臣”事外,又另添三宗:恩将仇报、专权夺位、乘危逼命。人数则由原先的七人增至二十三人。在原来的基础上另增项羽、樊哙、纪信、许复、戚夫人、如意、丁公、萧何、项伯、雍齿、王翳、杨喜、夏广、吕马童、吕胜、杨武十六人,分别转世托生为关羽、张飞、赵云、庞统、刘备正宫、刘禅、周瑜、杨修、颜良、文丑、王植、卞喜、孔秀、蔡阳、韩福与秦琪。其次,完善了时代背景及主人公司马貌的遭际。《闹阴司司马貌断狱》在三国果报故事的发展链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不仅在于大加拓展的篇幅以及佳妙的文笔,还在于冯氏使故事的性质发生变化——三国果报故事不再是属于陪衬地位的引子,而是真正成为了一篇独立成篇、体制完备的话本故事。

清《三国因》,清末戏曲、小说作家醉月山人编次。此书本自冯本,然叙事较之更为简略,删去冯本中的一些插曲,如司马秀才入冥府前小鬼戏秀才的噩梦。虽如此,篇幅仍大量增加,内容较冯本更为丰富,因为作者又增加了事件与所涉人物。《三国因》将冯本中的四案推衍至九案。其中,唯“乘危逼命”一案与冯本完全一致。稍作改易的有“屈杀忠良”“忘恩杀命”“无辜杀命”三案:“屈杀忠良”易名为“屈杀忠臣”,增谢公著作吕伯奢,吕嬖作刘安妻;“忘恩杀命”一案增加丁公,托生于禁;“无辜杀命”案易名为“专权夺位”,增李氏、王氏、如意、少帝、恒山王五人。“无辜杀命”案中,李氏作曹操正宫,王氏作孙权正宫,如意作阿斗,少帝作曹丕,恒山王作孙亮。另增新案“屈死

无伸”“诡谋网杀”“投降莫杀”“吞爵灭宗”“子绝父伦”五起,增有范增、陈平、虞子期、扈彻、义帝、子婴、闵子其、龙且、田广、刘友、刘恢、吕不韦、秦始皇、嫪毐、朱后,分别投为诸葛亮、周瑜、马谡、庞统、吕蒙、陆逊、张辽、马超、张闾方、刘表、刘璋、吕布、董卓、王允、貂蝉,另有吕禄、吕产、吕台三人投身为战马。于九宗案件外又另作描补,与案中人有交往者亦有下场,使周兰出世为周仓,桓楚为关平,漂母作蔡琰,项梁作姜维,章邯为钟会,董翳为邓艾,司马欣为邓忠。

## 二、三国果报故事流变的特点

三国果报故事由原始本事发端到成型再到进一步发挥,呈现出系统的嬗递轨迹,反映出话本从民间艺人到文人手中的演变流传。在演变过程中,冯本堪称二者之间的分水岭。“文人在创作拟话本时,对于旧作中的杰出篇目常常是稍加润色就全盘收录的。”<sup>[4]</sup>故“三言”中所辑录的宋元明旧话本,虽经过冯梦龙润色,但大都保留了原来的市井本色。然而《闹阴司司马貌断狱》的文化品格却比较特殊。《闹阴司司马貌断狱》固然也是本自前代旧话本,但是,一则只是入话,并未深入人心,旧作的读者基础不广泛,二则故事平淡无奇,不以情节取胜。很明显,冯梦龙辑录这一篇不甚出彩的入话故事,不是因为它完美,恰恰相反,是因为它蕴藏着非常大的再创作空间。而《三国因》正是清代文人小说家在沿袭冯本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其文人色彩的。

### (一) 议论性

三国果报故事的文人性特征最明显的表现便是议论性的增强。《五代史平话》中的三国果报仅是寥寥数语、粗陈梗概而已,无一字议论。及至“由元代书会才人杂抄《三国志》《通鉴》类史书乃至《事林广记》这样的类书,同时层累吸收了宋、金、元尤其是金、元时期的‘说三分’乃至元杂剧的某些因素编纂而成”<sup>[5]</sup>的《三国志平话》,议论性稍稍显露。结合宋金元时期混乱的社会现实,很难说书中所增设的一些情节不是民间艺人在借司马之口申心中所怨,如司马仲相醉骂始皇无道,又骂刘邦、项籍起义使天下大乱、百姓不得安生等。但这只是一种共性心理的流露,点到为止,与《闹阴司司马貌断狱》中大篇幅的系统性议论相比,实在是相形见绌。冯氏将三国果报故事拓展

为完整话本后,体制一应完善,得以利用篇首诗与篇尾诗尽情发表议论。在引晦庵和尚的《满江红》作为入话点明题旨之余,还意犹未尽,又另发表了一段议论对其加以阐释:“劝人乐天知命之意。凡人万事莫逃乎命,假如命中所有,自然不求而至;若命里没有,枉自劳神,只索罢休。”<sup>①</sup>除去因体制之便而加入的直接议论,更有大量穿插文中的间接议论。司马貌的书生身份为冯氏大开方便之门。一方面,冯氏在文中引入诗作,作《怨词》一篇并题诗八句以抒发对世道不公的愤慨;另一方面,由于司马貌是儒生,冯氏得以合情合理地将儒家道德观念引入这个本自佛教因果观念的故事中,以此作为评判善恶的标准,如忠奸观、是非观等。此外,由于题材特殊,全故事基本由对话构成,冯氏还借人物之口大谈见解。其中有玉帝见司马貌《怨词》后对于“天道”所作的阐述,也有司马貌与阎罗王关于“报应”的一番争执。所有的议论内容一致,前后呼应,全都统摄于编创者对于“命运”的思考中。其后的《三国因》保留了《闹阴司司马貌断狱》中所有的议论,并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如丰富了司马貌与阎罗王的论辩。除此之外,《三国因》的作者在呈给天帝的卷宗中又另写了一篇简短的文章作为这段历史的总结,可谓充分开掘了这个故事中所有可插入议论的角落。话本中的议论“随着个人创作成分的增加而增加”<sup>[6]</sup>,三国果报故事的议论成分从《新编五代史平话·梁史平话》到《三国因》的增加,清晰地表现了个人创作的介入。

## (二) 准确性

文人创作的另一大特点在于准确性。话本本是说话艺人演说故事的底本,难免粗陋。而文人对创作的态度则负责任得多,从最初的《五代史平话》至《三国因》,所涉人物由四人竟增至五十人,转世的安排也被精心设计。《五代史平话》中天帝判韩信、彭越、陈豨三人分别托生曹操、孙权、刘备,仅取三人平分汉家江山之意耳。《三国志平话》的判决依据与前者相同,但在结局安排上对三国的局势进行了一番大致交代与分析:曹操占天时,江东孙权占地利,蜀川刘备占人和。到了《闹阴司司马貌断狱》,情况开始大不相同。司马貌不仅是根据人物经历寻找三国故事中

能大致与之相对应的人,还详细地根据情理给出了判决的理由。如刘邦转世为汉献帝的原因,除去身份因素外,还因为汉献帝“一生被曹操欺侮,胆战魂惊,坐卧不安,度日如年”,力求心理状态也与前世相呼应,并以融入的儒家忠义观的道德评价作为判决依据——“因前世君负其臣,来生臣欺其君以相报。”《三国因》的判决情况与冯本相类,不同之处在于增加了秦汉年间人。三国时期群雄并起,“事状无楚汉之简”<sup>[7]</sup>,而楚汉之争仅短短四年的历史,转世的英雄远远无法将三国故事的主要人物完全囊括在内。当楚汉争霸中的知名人物已被利用殆尽,意犹未尽的《三国因》作者便将涉案人物向上延伸至秦朝,力求面面俱到。文人作家的准确性还表现于补充了大量的历史材料。《三国志平话》中,韩信向司马仲相自陈身世,提及自己曾为刘邦立下十大功劳,到了冯本中,这十大功劳被完完整整地罗列了出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与汉王定了三秦;又救汉皇于荥阳,虏魏王豹,破代兵,禽赵王歇;北定燕,东定齐,下七十余城;南败楚兵二十万,杀了名将龙且;九里山排下十面埋伏,杀尽楚兵;又遣六将,逼死项王于乌江渡口。”冯梦龙文史修养极高,对“十大功勋”做填充完全是学识的自然流露。《三国因》的作者在冯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次加工,文笔更为精炼,更为书面化:“明烧栈道,暗渡陈仓。定二秦,救荥阳,掳魏豹,擒赵歇;北定燕,东定齐,连下七十余城;南败楚兵二十万,九里山十面埋伏,遣六将逼项王于乌江。”<sup>②</sup>这些历史材料的补充不仅是量的增加,还有细节的打磨。冯本为渲染司马貌所生活的朝政黑暗,插入灵帝西邸卖官一事用以证明,并清清楚楚地标注年号“光和元年”。《后汉书·孝灵帝纪》载:“光和元年……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sup>[8]</sup>与之相合,而所售官爵的价格“欲为三公者,价千万;欲为卿者,价五百万”,也与史书记载相符。文人作家追求准确的严谨态度显露无遗。

## (三) 个性化

如果说议论性和准确性是显性表现,那么个性化则是隐于行文之中的、又最能体现文人性的一点。司马书生形象首次出现于《三国志平话》

① 本文所引《闹阴司司马貌断狱》均出自明代冯梦龙《喻世明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② 见清代醉月山人编次《三国因》,刘世德、陈庆浩、石昌渝所编《古本小说丛刊第一十七辑》,中华书局1991年出版,第944页。



中,在此书中,司马仲相不过是功能性人物,作者只是借其口引出秦始皇的一番议论,将他的害民与光武帝的爱民作比。所以司马仲相在此书中仿佛破空而来,只是个概念化、符号化的书生形象而已。到了《闹阴司司马貌断狱》,增加了司马貌的人生遭际及其所生活的时代的背景,将其塑造成天资聪颖然而怀才不遇的落魄书生。这个形象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冯梦龙本人——自幼聪明,才华横溢,却科场失意,一生功名蹭蹬。很明显,这番设计不是巧合,更不是闲笔,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拉近故事主人公与自己的距离,好借彼之口抒一己心绪。前代《三国志平话》中的作者观念只能从客观的判词中揣摩,且表现的是当时说话艺人的共性,是社会的共同观点,然而冯本却能详尽阐明,流露出冯氏作为文人作者所表现出的主观感情,如“即如我司马貌,一生苦志读书,力行孝弟,有甚不合天心处,却教我终身蹭蹬,屈于庸流之下?”,这种不甘与酸楚,只有失意的文人才能感同身受。

此外,冯氏虽然承袭了彰善癉恶的固有主题,但思想境界较前人则有所深化。从《三国志平话》到《闹阴司司马貌断狱》,最具意义的改变还不在于案件和牵涉人数,而在于审判者的变动:司马书生跃为故事主角,从见证者成为了参与者。《三国志平话》中的司马书生只是参与了案件的审理过程,最终的判决仍由天帝做出。而冯本则加强了主体的主动性,提高了人的地位:主角司马貌不仅敢于质疑冥判的公正性,甚至代天帝行判决职责。这其中表现出来的人性化色彩与明代解放人性的思潮相合。《三国因》的作者则进行了一番更为大胆的改动:司马貌代行决狱职权后,并未立刻回到人间,而是成为阎王的座上宾,与其谈笑风生,平等对话。这无疑是文人自尊心的投射,甚至可以说是升级。前人只是希冀得到天子的礼遇,而《三国因》的作者直接让司马貌用学识令神祇心悦诚服。

### 三、三国果报故事流传原因索解

三国果报故事情节平淡,人物形象不鲜明,即使是文笔最佳的冯本,在“三言”中也不算佼佼者,它能从宋元一直流传至到清朝,是由题材本身的吸引力、接受群体与编创者共同决定的。

#### (一)题材的商业潜力

在故事开头明晰两世因果缘报,作为构架全书的引子,在古代小说中屡见不鲜,如《姑妄言》,开篇借“城隍断案”将书中主要人物的前后世一一对举,利用前世因果来结纂全篇;《醒世姻缘传》利用前世恩怨,设置转世复仇展开故事,甚至是《红楼梦》《水浒传》这样的名著,也是以介绍前身开篇的。凭借这一创作手法,三国果报故事直接串联了楚汉与三国两种题材。因乱世题材传奇性强,通俗文学创作一直对其偏爱有加,三国题材更是此类题材中的热门。三国题材相较其他乱世题材别具优势:远如春秋战国时期,时间跨度大,国家关系复杂,更有一众姓名拗口的出场人物,头绪纷繁,难以驾驭;年代过近的朝代,文献资料记载翔实丰富,留下的想象杜撰空间不大。相形之下,三国时期虽然人物众多,事件密集,但繁而不乱,脉络清晰,且距离后世时间不算久远亦不算近。一方面,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相似,没有给后世读者带来理解上的障碍,且有《后汉书》《三国志》等史料作为参考;另一方面又留有充分的时间空隙让后人附会传说、编纂野史、搬演戏曲,使故事不断丰富。依附于三国题材的三国果报故事得以一直存在,甚至在明清时期还焕发了新的生命,从入话一跃而成为完整的话本小说。在这一点上,《三国演义》的成书与流行功不可没,它给这个故事带来了新的刺激点,注入新的活力。虽然三国故事自魏晋南北朝时期便受人青睐,但真正让这段风起云涌的历史受到上至士大夫、下至市民普遍欢迎的作品,非《三国演义》莫属。在冯梦龙所生活的明末,《三国演义》早已风靡天下,《闹阴司司马貌断狱》中所补充的大量三国人物及其经历很明显可以看出《三国演义》的影响。如判决中对关羽的设定,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将等事迹属于艺术再创造,不见于史籍,而是散见于平话与杂剧中,系统整合了这些情节的正是《三国演义》。如果说明代的读者将《闹阴司司马貌断狱》当作《三国演义》的衍生作品来阅读,这完全是有可能的。

除此之外,“冥判”情节还渗透着灵怪与公案因素,前者在宋人罗烨的笔记小说《醉翁谈录·小说开辟》里被列为小说八类之首,后者则是宋元话本中成就最高的两大类型之一,而且到了明代,尤其是明中后期,“公案题材受到通俗文学创

作的普遍关注……受这种创作风气的影响,不少小说作品有意加入一些公案的成分”<sup>[9]</sup>。

## (二) 接受群体的审美趣味

话本的主要受众为文化水平偏低的普通民众,上图下文的至元新刊《三国志全相平话》即为佐证。而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又云:“佛氏之因果,亦为中人以下说法。”<sup>[10]</sup>可见,话本读者与虔信果报观的群体具有高度的重合性,在话本中出现果报情节,实在是题中应有之义。元代社会法制失衡,人们转而在宗教的因果报应中寻求心理平衡。元代说话艺人将《五代史平话》中的只字片语敷衍为完整的小故事,可谓敏锐地捕捉了接受群体的心理需求。事实上,从整个小说的发展史来进行观照,果报观与小说的渊源由来已久。轮回果报虽是佛教概念,然而报应观念在先秦时代已有萌芽。果报出现在小说中的时间最早亦可上溯至六朝的“释氏辅教书”,“至明清,类似的写作仍不绝如缕”<sup>[11]</sup>。话本小说作为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的一环,吸收果报观念是自然而然的现象,而且果报观进入小说,尤其是以历史人物为主角的小说,也有其必然性。对于后人而言,历史人物的命运已成定局,即使心存遗憾也无可奈何,但文学中的果报则赋予了后人弥补心理遗憾的自由,因为它能够勾连数世,前世结局存在不公,有恩怨未偿,后世亦可续接。在一系列三国果报故事中,《三国因》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三国志演义》续书,但是从内容上看,完全是在《闹阴司司马貌断狱》的原有格局上进行的扩写。无论是从语言、人物形象还是精神内涵等维度进行评判,作为一部续作,《三国因》绝对算不上高明。在此书中,人物只是事件的附庸,事件只是评论的素材,然而《三国因》能在续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并流传至今,正是因为它满足了《三国志演义》给它庞大的读者群带来的遗憾之感。《三国志演义》虽在一些事件上有移花接木之处,但是总体还是遵循着历史的走向,即蜀汉集团既寄寓着作者政治理想,同时又扮演着失败者的角色。这其中的矛盾给读者带来了强烈的失落感与不平。果报则填补了这种不平——非是天命不公,乃是前世有因。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云:“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sup>[12]</sup>通过勾连两世,实现“善恶终有报”无疑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喜剧结局”。《三

国志演义》集历代三国题材创作之大成,其中就包括汇集了宋代“说三分”成果的《三国志平话》,然而开头的轮回果报故事却因荒诞不经、影响历史演义的严肃性被罗氏剔除在外,可它最终又因荒诞给予了读者联想的空间,得以用续书的面目回归三国故事系统。

## (三) 编创者的创作心理

由于话本小说的商品性,题材的商业潜力、读者的阅读偏好都是编创者所必须要考虑的。但是,受欢迎的题材着实不少,读者的阅读心理也非常复杂,话本的面貌最终还得回到编创者本身。一个故事能从前人留下的庞杂故事中脱颖而出,必定与编创者的创作动机存在一定的契合点。因编创者生活经历、文学观念等条件的不同,创作动机也因人而异,但是从话本小说所具备的功能来看,具有普遍性的创作动因有两个:娱乐和劝惩。看似平平无奇的三国果报故事恰好蕴含着实现这些意图的因素。

“小说就起源于人们休息时讲谈故事以相娱乐,游戏、娱乐是其与生俱来的基本属性”<sup>[13]</sup>,由于三国果报故事要消解楚汉及三国人物的历史结局带给人们的不平感,故事中的人物结局需要基本属实,与读者的认知相符,但是人物经历可以有不同程度的虚构。编创者在历史人物命运既定的大框架下,用里巷传闻任意加以填充,使虚实有机结合,增加戏剧性。以《闹阴司司马貌断狱》“屈杀忠良案”中的彭越为例,导致彭越之死的直接凶手无疑是吕后。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吕后除彭越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彭王壮士,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sup>[14]</sup>而到了冯梦龙笔下,则成为了荒唐的私怨:“三杯酒罢,吕后淫心顿起,要与某讲枕席之欢。某惧怕礼法,执意不从。吕后大怒,喝教铜锥乱下打死……。”冯梦龙是史学大家,治学严谨,甚至还考据过余邵鱼《列国志传》中的疏漏之处,这些轶闻野史,无疑是他有意穿插的游戏笔墨。

在正统文人眼中,小说一直是不入流的“小道”,因此,在小说的发展过程中,小说家有意识地强调其劝惩功能,以提高小说的地位。本身就带有道德导向和约束性质善恶因果报很容易受到青睐,涉及因果报应的小说不胜枚举,有些甚至直接以“报”名篇,如《宫花报》《麟儿报》《鬼神传终须报》《杀子报》等。而在融入小说之后,果报又

被开掘出宗教之外的新意义。果报在文学与宗教中的意义不可一概而论,在小说中,神灵与其说代表着某种信仰,倒不如说是增强说服力的工具。“许多中国小说中的冥报感应只是为适应受众而披上的外衣,是为吸引读者注意力而扔出的‘肉骨头’。”<sup>[15]</sup> 编创者只需套用因果报应的模式,便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展开说教。

## 四、余论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果报小说由于“封建迷信”,一直被人以糟粕视之,颇受冷落。涉及果报情节的古代小说不计其数,只因“封建迷信”,对这样庞大的文学事实视而不见,是古代

小说研究的缺失与遗憾。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学界才逐渐摒弃对它的偏见,开始正视它的文学价值。纵观三国果报故事的演变与流传,既有民间艺人的构建,又有文人的加工改造,融会了社会心理和个人心理。民间艺人凭借距离优势,感受大众的心理期待,并将其反映到文艺作品中。文人在此基础上,用他们的学识和修养对朴素的故事框架进行填充,实现历史知识的普及和道德评判。“一个故事的再创作,只要不是完全照搬,来自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身份的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总会或多或少融入自己的思考,这期间微妙的差异足以使得故事内涵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sup>[16]</sup> 这些变异正是三国果报故事的价值所在。

## 参考文献:

- [1] 杨义. 中国叙事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9:183.
- [2] 胡以存. “因果报应”模式下的民间叙事与文人叙事[J]. 文艺评论, 2013(6):51-55.
- [3] 盛瑞裕. 闲话《三国因》[J]. 明清小说研究, 1988(3):281-282.
- [4] 朱家英.《三言》与话本小说的文人化:略析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之关系[J].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14, 30(11):54-56.
- [5] 罗筱玉, 张明明.《三国志平话》成书考述[J].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29(5):82-87, 93.
- [6] 刘勇强. 掘藏:从民俗到小说[J]. 文学遗产, 1997(6):76-85.
- [7]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132.
- [8] 范晔. 后汉书·孝灵帝纪:卷八[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0:88.
- [9] 苗怀明. 论明代拟话本小说公案题材书写的新变:以“三言”“二拍”为核心[J]. 福建江夏学院学报, 2020, 10(2):2-8.
- [10] 纪昀. 阅微草堂笔记[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5:25.
- [11] 刘勇强. 论古代小说因果报应观念的艺术化过程与形态[J]. 文学遗产, 2007(1):118-129.
- [12]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2:12.
- [13] 纪德君. 明清小说家“以文为戏”摭论[J]. 社会科学辑刊, 2020(4):192-199.
- [14] 司马迁. 史记·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M]. 北京:中华书局, 2010:5702.
- [15] 傅修延. 中国叙事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25.
- [16] 刘勇强. 古代小说创作中的“本事”及其研究[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52(4):68-75.

(责任编辑:王圆圆)